

王澍：

克制即遠見

為城市發展「留白」



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

繼5月中旬成都建築師劉家琨的三天行後，來自杭州的建築師、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王澍6月上旬亦在港大待了一周。這是王澍的第二次訪學，作為香港大學邀請的傑出訪問教授，這三年他每年要來一趟港大：或公開演講，或參加學生作品評議，最近是一場師生座談。

王澍和劉家琨，都是普立茲克獎得主。這項創立於1979年、有「建築學界諾貝爾獎」之稱的全球最主要建築獎項，每年一次，表彰「在世建築師，其建築作品展現了其天賦、遠見與奉獻等特質的交融，並透過建築藝術，立下對人道與建築環境延續且重大的貢獻」。

到今年為止，普立茲克獎得主共54位，華人建築師只有三位：1983年的貝聿銘先生、2012年的王澍，以及2025年的劉家琨。榮登此榜，當然表明都已進入當代建築大師之列。

這是兩位兼具藝術家審美、文人理想和工程師動手能力的優秀建築師的幸運。王澍年輕時飽讀哲學思想著作，劉家琨早年更是心有旁鶩的小說家。他們的幸運在於：成長於一個知識分子是「臭老九」、一度「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」的反智年代，只有極少數有遠見和定力的思想者，才能長期默默無聞地思考和研究，歷經歷史浮沉和歲月滄桑後，居然還能被人看見。要知道，屠呦呦女士是85歲高齡才拿到諾貝爾醫學獎。而王澍獲獎當年，



●建築師王澍
受訪者供圖

還不滿49歲。今年獲獎的劉家琨則69歲。

這也是中國建築學界的幸運。在經歷了當代中國40年狂飆突進式造城運動後，王澍和劉家琨的脫穎而出，固然是他們的才華天分和苦心孤詣所致，也是近百年來中國城鄉巨變的一個複雜印記。前輩大師貝聿銘受益於長期在美國求學生活，作品和成就也主要來自於海外經歷，而王澍和劉家琨的學習成長和被廣泛認可的建築作品，則全都來自於當代中國的本土建築實踐。他們各自設計的寧波博物館、成都西村大院等別具神思的代表作，是中國社會人心浮蕩、山河變遷背景下，少數兼具藝術家創意、文人心性、行動者能力的知識人的心血凝結之作。也許可以說，他們能獲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您怎麼看香港這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建築特色和城市風貌？

王澍：從城市規劃的角度，我一直很欣賞香港，100多年了，到今天還能有超過50%的土地處在相對自然狀態（編者註：香港已發展土地佔香港總面積的24%，其中住宅約佔7%）。我經常拿這個案例來做比較，比如同樣的城市面積，深圳已經把土地全用完了。這說明香港的城市規劃很有前瞻性和自覺性。人和自然之間要達到平衡，就需要人做一點讓步，做一點忍耐。當然在這種狀態下，香港的高層建築林立，密度極高，但是保留了自然環境。對這點我很讚賞，我在內地常常提出各地城市要向香港學習。

不要小看城市發展和自然環境達到平衡這一點，香港是做了很認真考慮的，包括立法方面的限制。內地城市的這種討論不是說沒有，但基本處在失控狀態，很少見到一個城市說為了

保護自然，要留下一半自然環境，哪怕讓其他建築做高密度一點的。1980年代曾有一個很著名的專家，還提議說可以把西湖填掉，這樣市中心就可以造更多高樓大廈了。幸虧當時的杭州市政府沒接納這個意見。

香港的優點，是有長期嚴格的法治根基，能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。這帶來一個很好的結果，就是大量的老建築、歷史建築因為所有權問題，你沒辦法簡單地拆。所以在香港的中心區，還可以看到大量的老建築，不一定上百年，哪怕是幾十年的，都帶有生活的痕跡，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生活史的連續性。香港的精華在於，香港是一個自覺保持和自然平衡的高密度的混合城市，是不同歷史時期完全不同的功能類型的混合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您對內地的快速造城運動、出現大量超高型建築有強烈批評。不過，大規模城市化似乎早是常態，這似乎對未來的建築師行業也是一個挑戰。您有什麼好建議嗎？香港這麼一個城市化相對舒緩的城市，是否可以有所鏡鑒？

王澍：內地已經意識到這個做法不行，走不下去了。實際上市場也已經飽和，這種狀態下城市發展也必須尋求轉型。這對中國的城市和經濟而言，都是很難的。過去幾年，有關方面已經明確：城市也好，鄉村也好，接下來的方向都不再是大拆大建了，而是城市更新或者鄉村更新。但怎麼做？規劃界、我們建築界，在習慣了大拆大建後，面對城市更新這個話題，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麼做。另外從房地產投資來說，和以前也不一樣了。現在小打小鬧的更新是有的，真正大規模的更新，很難說有哪個案例很成功，我覺得還都在摸索狀態。但這個轉型很重要，如果轉型成功的話，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更燦爛的未來。

香港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城市更新了，因為不能大拆大建嘛。你想在老建築旁邊造一個新樓，場

地很小，就要動腦筋。這都是城市更新中必然要碰到的，這一點上我覺得內地可以再向香港學習。比如香港做城市和鄉村更新的兩個例子：一個是大館。大館屬於比較好的活化例子，這樣的例子其實還蠻多的。並不是說所有建築都要著名建築師做才行，只要不破壞原有的脈絡，做時手腳不要太重，有這個態度我覺得就很好。其實大量的有意思的建築是無名的，我倒是很欣賞很多無名的、小小的、有意思的想法，一個城市裏這樣的東西越多，就越有魅力。另一個是谷埔（編者註：谷埔是新界以北靠近中英街的一個典型的華南村落，還不怎麼通車，港大建築學院王維仁教授在那裏有一個已持續多年的鄉建項目）。維仁隨時和他熟悉的村民打招呼，他的學生則個個眼睛裏閃着光。像這樣的建築師如果有100個，想想看香港會發生什麼？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內地的北上廣深包括很多二三線城市，這些年來都經歷了一個大拆大建、狂飆突進式的建設過程。而香港的城市發展，用了一百多年時間。您剛才提到的混合城市這個概念，內地現在正開始提倡。從您作為建築學者的眼光來看，這個過程中有何經驗教訓？

王澍：原則上我反對大拆大建，大拆大建對一個地區的歷史和現實生活，破壞性很大。對於正朝現代主義建築方向發展的城市，我覺得不要過度自信。人類沒有辦法用這麼短期的人工方式，來替代一個城市、一個地方的生命歷史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比如所謂「科學」的城市規劃，就是那種市中心全是辦公樓、郊區全是住宅的功能主義的城市規劃，其實規劃界、建築界從1960年代就

已經開始猛烈批判，英國人在1970年代已經宣布他們的所有新城運動全部失敗，他們想了各種方法，想讓新城有生命力，最後還是都失敗了。

但很不幸，別人犯過的錯誤，我們很多內地城市必須自己犯過一遍才能有經驗。這個特別可惜，學術界已經在批判，但還是擋不住這個潮流。所以，一個城市要想健康發展，一定需要兩方面的合力：從上朝下和從下朝上，需要有一個平衡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您對香港觀察很仔細，對香港的城市規劃和更新等有正面評價。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模式被內地學習借鑒後也出現了弊端，比如土地財政、賣樓花、狂建高樓大廈等，您對此怎麼看？

王澍：土地財政這個模式可以說是瘋狂的。我在十幾年前就已經說過，這種房地產發展模式就跟吸毒一樣，總有一天會看到要發生什麼，現在就是進入到必須戒毒的狀態了。包括那種高樓大廈模式，主要都是強烈的利益驅動。因為市場其實並不穩定，大家都追求要在那麼快的時間來設計建設變現，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最快速、最大限度的盈利。所有的人都有這個擔心，所以才會形成這樣一種狀態。

我對香港不熟悉，不過我注意到兩個現象：一個是香港好的公共建築不少，不過好一點的公共建築，怎麼幾乎都是外國建築師做的？其二，早期香港包括住宅都有過很有意思的設計，為什麼現在沒了？

其實住宅設計也可以有創新。最早現代建築運動就是一戰後從歐洲的住宅開始的，要給大量的工人提供住處。但隨著越來越標準化，出現一個核心問題，就是你沒有鄰居、沒有社區了，這些現代住宅跟現代化養雞場、養豬場都成了類似模式。但人是有人性的，人需要有鄰居和社區。住宅設計出現了惰性。

內地城市95%的建築都是住宅，在住宅方面如果沒有聲音，怎麼能說我們是在做建築的創新？！（編者註：王澍在杭州曾設計過6棟100米高的高層住宅。）我起了個名字叫『垂直院宅』。什麼概念？就是我要讓哪怕住在100米高的住戶，仍然能體會到兩層帶院子住宅的感覺。這是我2001年設計的，變成現在市場都在效法的一個對象。

特寫

夫妻建築師



●王澍與妻子陸文字
受訪者供圖

主任。王澍建築作品的一個標誌性風格，是對傳統建築材料的廣泛應用。比如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所有建築，都由團隊在杭州大拆遷中從全城收集的700多萬件磚瓦石和陶瓷片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。這是王澍建築美學思想的獨特應用，本身也極大降低了建築成本，而類似這些傳統材料的研究應用和具體實施，主要由陸文字負責。

作為長期合作夥伴，兩人多年來聯袂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和社會榮譽：如2010年的德國謝林建築實踐大獎；2023年被選為法國建築科學院外籍院士；2019年獲得北美建築教育聯盟Tau Sigma Delta金獎；今年5月，他們還應邀擔任第19屆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——中國澳門展區的聯合策展人。

王澍曾在採訪中說：「是她成就了我。她是我的導師，在沒有遇到她的時候，很多人都認為我會去出家當和尚。」愛情觀要不要這麼酷烈當然

可以商榷，但三十多年相伴，兩人確實成了集愛情、友誼、志業三位一體的神仙眷侶。

成名後的王澍夫妻，仍然保持着樸素和謙遜。據說陸文字曾講：「一旦成名，生活就不屬於自己了。我更偏向把時間留給兒子，但我也很開心能夠靠我堅信的建築理念，幫助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好。」

英國哲學家以賽亞·伯林把出類拔萃人物的問學成長路徑大致分為兩類：狐狸和刺猬。王澍本人應該是刺猬型人物，看似原地不動，但會越來越深地向內鑽研進去。「隨着經驗越來越多，人會變得越來越強大。年輕時可以靠一腔熱血，到這個年齡，就要靠足夠的經驗和洞徹的思想能力。」

不過，功力高深、功成名就如王澍，也會出現無力感。「偶爾我會想一個問題，就是要不要放棄一切，隱退到某個鄉下去？」

這並非矯情，而是王澍真誠的心靈寫照：一個一直保持炙熱情懷，希望以人文美學改造建築世界的理想主義者，在終於站在巔峰後，卻仍然會有這樣的人生困惑。眼睁睁看着世界一步步變成了今天的樣子，清醒靠自己，又能做些什麼呢？這是王澍的冷靜自省，也是類似《傳道書》作者們的千古同問。

寫王澍教授，難免要寫到他的妻子、長期合作者陸文字教授。兩人是夫妻，更是幾十年來形影不離、合作默契的工作夥伴，據說一度有衆多人發起簽名倡議普立茲克獎評委會把獎頒給二人。在47年的普立茲克獎評選史上，女性獲獎者寥寥無幾；其中伊拉克裔建築師扎哈·哈迪德、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都未婚；作為夫妻共同得獎的，只有2017年的西班牙建築師卡莫·皮里奧和丈夫拉蒙·比拉爾塔，以及2021年的法國人安妮·拉卡頓和丈夫讓-菲利普·瓦薩爾。

兩人相識於南京工學院（今東南大學），陸文字比王澍低幾屆。

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王澍原本想去廣州美術學院工作。美院系主任鼓動說：只要你來，保證你一年後騎上雅馬哈大摩托。他一度坐上了南下火車，路過杭州下了趟車，「到浙江美院（後來的中國美院）跟我認識的幾個人談了一晚上哲學和藝術，第二天早上我直接回了南京，決定不去廣東了。」1997年王澍成立業餘建築工作室，陸文字是唯一合夥人。

十年磨劍。王澍遇到了一個特殊的機會，中國美院將象山新校區的建築設計交付於他，要求只有一個：要達到國際水平，但造價只能是同樣工

程的一半。王澍應允的條件也只有一個：絕對的自由。這後來成了王澍的代表作之一。

他們所有的作品，最著名的如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（2007）、寧波博物館（2008）等，都打上了王澍陸文字二人的共同烙印。王澍回憶：「象山校區期間，為了趕工期，有四年時間兩人都住在靠近學校的小旅館，每天工作到半夜12點。後來為了照顧家庭，晚上10點一定讓陸老師回家。」

兩人的合作，王澍主創意，「就想怎麼超越自己，是詩人的角色」，陸文字則負責作品的落地。陸文字外表文秀，其實性格堅毅，思維嚴謹。他們的大型公共建築作品，現場最多會有數千人在同時工作，扮演前線總指揮角色的是陸文字。王澍說：「這不是一般的能幹，特別能幹，特別能容忍我。」

在港大建築系的師生交流環節，有人問到兩人合作情形，王澍認真半自嘲：「常常處在發呆發愣狀態。」快言快語的陸老師幽默補上一刀：「我們都這麼忙了，你怎麼還這麼『遊手好閒』！」滿座大笑。

陸文字的麻利和能幹顯而易見。茶歇間隙記者借港大建築系辦公室一角採訪王澍時，陸老師半途悄然推門進來，給丈夫端了杯溫水，給記者拿了幾塊